

两年多前，我写过关于阿塔爾的第一篇小说《蕾奥纳的壁炉节》的文章（见《阿塔爾：值得期待的文学新人》，《文艺报》2017年4月10日），对他的出现报以了非常的期待，内蒙古的文学也需要新面孔、新力量，以冲破近10年来相对沉寂的文坛。此时，我想起2018年3月，在《草原》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阿塔爾获得了“新人奖”，颁奖嘉宾是我尊敬的蒙古族诗人阿尔泰，当年近七旬的阿尔泰先生将奖杯交给还不到23岁的阿塔爾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感动，感觉这是老一代作家在向年轻人传递文学的接力棒。那小小的奖杯一定是沉甸甸的，它代表了老一辈作家的深切希望，也象征了新一代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之后，我与阿塔爾又见过几次面，但是很少谈及文学和他的写作。我认为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在写作完成之前，外人介入其中指手画脚是对写作者的不尊重，也会扰乱写作者的思路，尤其是“90后”的作家，对我们来说，他们真的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或许只能给予他们写作之外的帮助和支持，让他们自由疯长。

阿塔爾应该是内蒙古小说的异类，就像最近刚刚出道就获得一致好评的1999年出生的女孩渡澜一样。这两个人的写作，我们很难用以往的惯常的阅读经验去解读他们，他们的出现是对内蒙古小说创作的一个逆反，他们是来自草原的两只不可预知的文学“狼孩儿”。对比两人的写作，我感觉渡澜的小说与阿塔爾的小说是两个极致。阿塔爾的语言是标准的透亮的汉语，清晰而好读，虽然内容我们大多数人难以想象和认知；而渡澜的语言却是生涩的，有时候甚至是混浊的，但是她的故事却是现实的，并且有穿透现实的锋芒和深刻。阿塔爾的写作是经过大量的阅读而形成的汉语流，它顺着叙述宽敞的河道四溢流淌；而渡澜却是本能的对汉语的陌生化，她在遣词造句的时候，选择的词字常常与我们司空见惯的用词产生错位甚至抵触。德勒兹曾说：“每位伟大的作家面对他所使用的语言时，总像个异国人，尽管这是他祖国的语言。”（见《批评与临床》，吉尔·德勒兹著，南京大学出版社）渡澜当然还没有达到这种自觉和成熟，但我在她的叙述中总是感觉她对汉语的不确认性。她与阿塔爾一样，母语是蒙古语，并且他们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汉语，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在写作中应该都是用蒙古语思考的，只不过阿塔爾是极力摆脱这种思考，试图用一种欧化的标准现代汉语来逃逸母语的叙事屏障，而渡澜则是将两种语言在叙述过程中进行杂糅或者碰撞，让汉语产生“怪挛”（德勒兹语），给我们的阅读带来某种“异质性”的变化。这一点，我在“80后”作家娜仁高娃的小说里有过类似的感受，比如将句子主谓宾关系的调换，对非生命体的拟人化，还有夸张的修辞等等。这些尝试都可能为汉语写作注入一种新鲜的表达方式。



让他们自由疯长

——谈阿塔爾的小说《雪原战争》及其他 □兴 安(蒙古族)

阿塔爾的《雪原战争》堪称一部“秘史”，800年前，蒙古族产生了一部奇书《蒙古秘史》，它通过蒙汉两种语言的拟音拼写的转换，隔绝了只懂汉语不懂蒙古语的外族读者，同时也阻断了只懂蒙古语不懂汉语的本民族的读者，但它就是以这种奇妙的方式流传至今，成为蒙古族独特而又可信的历史文本。而《雪原战争》则是一部虚构的幻想意义的人类史。虽然它依然没有摆脱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的某些影响，比如小说沿用了“北境”这个词，尽管它与前者没有关联；又比如故事中的某些人物关系的设置等等。小说几乎穷尽了作者所有的知识和想象，构建了一个独立的并且能够自圆其说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的神话或者历史有着原型上的相似性，甚至还有明确的时间点（11世纪），但是它的存在与运转却又属于另一个维度空间。比如小说中的“努古斯”王国，它的名称显然源自史前蒙古族最古老的两个部落之一“捏古斯”。还有其中的人名或者部落名，多少都与蒙古族常用的名称有关，比如阿尔斯兰（狮子），比如巴尔夫（老虎）以及栗娜。但作者却又故意在书写上区别于以往的“阿尔斯楞”“巴尔虎”和“苏娜”，即所谓标准化的名称翻译。在这方面，渡澜也同样有意识地进行着改写，比如小说《美好的一天》（见《草原》2019年第11期）中的人物“巴日思夫”，甚至连作者的名字“渡澜”也不同于我们常用的“朵兰”。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更年轻的作家们，在写作初始便有意与我们拉开距离，试图重新梳理蒙古语与汉语之间的对应关系？

《雪原战争》肯定与蒙古族神话和历史有关，但它

肯定不是蒙古历史，作者似乎有更庞大的野心，他指向的是人类的境况。他将历史与神话、幻想与现实进行拼接，将维柯在《新科学》中所说的神、英雄和凡人三个时代并置于同一个时空。小说里有军阀和封建割据，有冷兵器时代的战神、国王和远征军，也有现代化的无人机和广袤的油田。这便使读者不断地转换于历史与现实、幻想与真实当中，并从中找寻着两者的关系、发展的逻辑及其真相。

我还注意到，在小说每一章的开端，作者都会虚构一部古代典籍，并杜撰一段引言。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暴行者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十二圣徒列传》。”我想，这句格言式的语句即使不是小说的主旨，也至少是作者对历史的规律性的一个总结。小说还虚构了一座圣山，叫阔贝山。“阔贝”在蒙古语里有“份额”的意思，引申意可理解为公平公正，人人有份。而在结尾，阔贝山的陷落则标志着一个理想世界秩序的陷落。正如文中所述：“阔贝山的破灭也是我童年梦想的破灭，一个在我心中耸立了20多年的世界的破灭。”虽然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无法找到与之重合的山名，但是这座已经在作者的想象中存在了20年的神圣之地的毁灭，让一个不到25岁的青年开始重新认识和塑造这个世界。

当然，《雪原战争》不过是阿塔爾同名长篇的一个章节，但足以让我感到它的复杂性和史诗性写作的雏形。如果我要对这篇小說提出建议，我希望作者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加强更多细节化的历史场景以及主要人物内心的刻画与揭示，这是虚构写作与历史写作的重要区别，也是小说这种古老艺术形式的魅力所在。

一部悲壮的爱情神话

——评长篇小说《康巴女土司》 □吴道毅(苗族)

2019年6月，一共10卷本的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五辑）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昭示了康巴作家群源源不断的创作成就。在我看来，藏族作家牟子的长篇小说《康巴女土司》是这次康巴作家群书系的一个重要收获。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与亮点，是以20世纪30年代未发生的甘孜事变为背景，以康北高原霍尔女土司的爱情故事为经线，在讲述这一地区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的同时，演绎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悲壮爱情神话，并塑造了一个为了追求爱情幸福而宁愿舍弃土司地位的传奇女土司——格桑曲珍的生动形象。

作品描写的格桑曲珍的爱情，与一般的爱情故事大为不同，因为身为女土司，格桑曲珍的爱情注定无法摆脱政治的羁绊，并因此无法摆脱某种强烈的悲剧意味。当时的时局十分纷乱，对外，日寇侵华，半壁河山沦陷，民族危机不断加剧。对内，地方军阀刘文辉盘踞西康，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矛盾重重，外国宗教势力也蓄谋已久地在康区培养自己的代理人。信奉佛教的刘文辉一方面迎接第九世班禅行辕进驻甘孜，一方面又觊觎国民党政府给班禅行辕配备的精良武器，尤其是担心当地霍尔女土司与班禅结盟而危及自己的统治。正因为如此，当美丽多情的女土司格桑曲珍与英俊潇洒的班禅卫队长扎西泽仁真心相爱之后，一场旨在阻碍这一爱情的政治阴谋乃至战争便由此拉开了序幕。刘文辉先是以干爹的名义，指挥手下引诱格桑曲珍嫁给他姨太太的外侄——二十九军副团长杨泽贤，继而派重兵包围了格桑曲珍的土司官寨，对其进行软禁，生活上进行刁难或折磨，查封其巨额财产，用武力逼其就范，甚至使用毒计让杨泽贤与格桑曲珍强结为夫妻，最后又向香根活佛施压，逼其劝说格桑曲珍保全土司权力与财产而放弃个人爱情。在刘文辉看来，格桑曲珍追求爱情不过是一场笑话，牺牲感情以博取政治利益最大化才是正途。

小说着力赞颂的正是格桑曲珍为了自己的恋情而矢志不移。格桑曲珍从小就经历了土司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虽为女性，却见识过人，意志坚定。她青春年少，又美貌多情，与对她有过救命之恩的扎西泽仁倾心相爱，也非常珍视与扎西泽仁之间的纯洁爱情。无论是勇武强悍的康巴汉子贡布，还是温文尔雅的汉



族军官杨泽贤，都不能打动她的芳心。即使是对她恩重如山的叔叔香根活佛，也无法使她回心转意。在土司的权势、财富、土地等与爱情之间，她宁愿为了爱情而牺牲一切。为此，她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暗地里与班禅军政人员联络，通过武装行动打败了软禁她的刘文辉军队。尽管最后还是被强大的二十九军打败，失去了她作为土司本来拥有的土地、百姓与财富，但她仍然为获得了爱情与自由而倍感满足与幸福。为了爱情，她挑战了世俗的价值标准乃至社会禁忌，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的精神与情感世界，无疑已经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她追求爱情的执著与英勇无畏，显示出杰出女性的英雄豪气，昭示了高原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也为康巴高原涂上了一抹厚重的文化亮色。她的身上，闪现着人性的光辉，诠释着精神的高贵。她历经沧桑的爱情神话，书写着大写的人生。这正是格桑曲珍与一般女土司的与众不同之处。

围绕女土司，小说还特意安排了许多形形色色的

人物，如女土司的三位追求者——扎西泽仁、康巴汉子贡布与青年军官杨泽贤，女土司的两位丫头——它玛和雍措，头人雪奇与女头人卓娜，二十九军旅长章镇中、甘孜县长章家麟等等。在这些人物身上，交织着政治斗争或男女情爱等草原生活故事，也显示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凸显出人性的高贵与卑微。章镇中、章家麟兄弟都是冷血的政治动物，把成王败寇与心狠手辣当作政治信条或处世准则，但最终没有摆脱命运的捉弄。作为神父，欧洲人汤姆以传教与行善为幌子，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先进的武器在康巴地区实施政治暗杀——安排养子贡布暗杀戴季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却谎话连篇。雪奇头人经不住二十九军的政治诱惑，先是杀了情人卓娜，后又把枪口对准了女土司，显示了权力欲对人性的极端扭曲，他对女土司的背叛与卓娜的忠诚显出天壤之别。杨泽贤光明磊落，坚决反对对女土司实施不轨的流氓行为，并为保护女土司献出了生命。贡布作为老霍尔土司的传人，尽管与女土司家族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但对女土司的爱最终战胜了两个家族之间的血仇，用血肉之躯为女土司挡住了雪奇头人射来的罪恶子弹。在杨泽贤与贡布身上，演绎出爱情的真谛——爱不是索取，而是奉献。它玛、万连副与雍措出于感恩，也都为保护女土司献出了生命。女土司格桑曲珍的爱情神话里，渗透了许多年轻生命的鲜血，因此显得格外悲壮。

当然，小说也充满了现代反思意识。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土司制度与历史怪圈的反思上面。霍尔土司与老霍尔土司本是一家人，后来却为了土地、财产相互仇杀，100多年掉进血亲复仇的历史怪圈而无法自拔。无论是女土司格桑曲珍还是没有继承土司职位的贡布，都曾在这种历史怪圈中饱受苦难，甚至险遭杀身或灭门之祸。正如贡布找女土司复仇时所说：“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从来就充满了永无休止的权势争夺，为了权力，哥哥可以杀弟弟，妻子可以杀丈夫。为了权势，这片草地上发生着没完没了的仇杀和械斗……”这样看来，女土司放弃土司地位而选择爱情，何尝不是一种超越生存环境、走出历史怪圈的积极举措呢！

相对于时下一些在书斋中炮制的虚情假意、离奇古怪的故事，云南边地女作家马瑞翎的小说作品别具一格，其优美流畅的文字、质朴生动的叙述、宛转曲折的情节，蕴含着丰富的边地少数民族人文风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如西南部哑吹来的一股清风。

在她所著的小说集《最后的乐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一篇《野人寨》的短篇小说特别引人注目，其文笔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韵味，又有神秘的宗教色彩，还有中东一带古文学遗风以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亲切幽默感。这与作者的家世不无关系。马瑞翎的祖父是一位古文功底深厚同时又精通阿拉伯语的宗教学者，祖母的口头文学水平很高。马瑞翎自幼陪伴祖父母生活，在远离世俗的书香环境中健康成长。这篇《野人寨》描述了一群不同种族的人由于各自的原因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来到深山之中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栖息地。他们在野莽坪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公平和乐的、物质公有的柏拉图式的理想村寨，创造了诡异而又有趣的原始宗教文化。然而脱离现实大环境的理想小社会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财产的私有很快出现，群婚乱伦使得人口素质急剧退化，几代以后村寨的居民变成了白痴。人们理想中的家园消亡了。与时下某些作品将简单的道理表达得百转千回的风气相反，马瑞翎将复杂而深刻的东西简单化，使作品更具可读性。比如私有制和货币的出现过程，作者只是通过人们用鹅卵石兑换驴子所产生的交易过程，运用作品中人物的几句形象的对话，就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三过溜索》中，溜索是作为一种意向存在的。溜索是怒江大峡谷上一种用钢索连接两岸，便于人们吊在上面从波涛汹涌的江面上滑过的交通设施。三次过溜索的经历隐含着男主人公人生境遇的三个重要的转折，同时也暗喻民族的重重进步：第一次过溜索，阿此从一个天真懵懂的少年变成汉语学堂的学生，这时当地穷苦农民针对官府的压力反抗闹事，但未形成规模便被官府击溃；第二次过溜，阿此从一个纯洁本分的青年变成了敲竹勒索的骗子，此期间当地少数民族爆发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成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第三次过溜，阿此从一个普通的国民党乡保长成长为勤政爱民的好官，最后带领当地人民成功实现和平起义，迎接新中国的成立。这三次进步无论就个人还是整个民族来说，都已经是一种升华。这篇小说的人物刻画和情节设计已经超越一般的公式化和平庸化，细节描写十分精彩。

《昨夜的火》是反映婚外恋的小说。作者并未按常规去描写婚外情的种种行为，而是表现一种细腻动人的心态。人物的心理层次把握得十分准确。文中的女主人公赵蓓，虽沉湎于不可思议的单相思中，却又不耽于幻想，而是在对现实的妥协、服从和忍让之中千方百计地自我完善与上进。当她终于有机会与朝思暮想的人在一起，双方却又理智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昨夜，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就那么看着火，一直坐到天明。”经历了心灵的暴风雨之后，她面对现实，去重复平淡的生活。然而这“似乎又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重复’，这已经是一种更高阶段发展的新形态。换句话说，一棵根基不稳的树苗，在经历暴风雨的洗礼过后，将以一种新状态迎接未来的天气”。文章体现出了哲学思想。

本书中收录的《最后的乐园》是作者的第一部超过10万字的小说作品。“最后的乐园”有两层含义：其一，一个人成熟前的那个纯真而荒唐的阶段，应该算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乐园；其二，一个尚未被时代强行拉入怀中的化外世界，应该算是人类的最后一个乐园。本文以局外人的眼睛来注视峡谷族群那人类童话般的天真和诗性智慧，观察边地立体多元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人文地理。生动形象的语言背后揭示出深刻的道理：一个地方从闭塞走向开化，一个人从幼稚走向成熟，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进步。而在这种进步过程中我们会失去很多宝贵的东西。比如生活富裕了，却渐渐失去贫穷时的那种淳朴的民风；一个人成长了，慢慢少了荒唐多了智慧，却也变得老练、事故和圆滑，从而失去那份可贵的纯真。这些问题我们总也无法两全。因此，人们才喜欢怀旧、喜欢到原始偏远的地方去寻找心灵的栖息地。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文化也有生命周期。现代文明的致命弱点就是违反和触犯了大自然的某些规律与法则，当人类大范围感染文化病毒而无力自拔的时候，人类的土著和僻远的山民也许带有拯救人类的文化基因。”也许神秘遥远的怒江大峡谷正存在着这样的文化基因。

乍看这本具有边地人文浪漫色彩的集子，它仿佛是原生态的，仿佛一切都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搬到纸上来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把深刻、复杂或沉重的东西如实反映在文本中，这对于作家来说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使它们简单化。这需要作者在做了大量前期资料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思考，由现象上升到本质，本质再升华而形成观点。当属于作者自己的独特观点成熟之后，再通过情节和细节的设计将观点还原成现象。于是文章已不再是生活现象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哲理的表达，一种更高层次的新形态。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螺旋式上升。大凡这样的文章都很耐读。一般的读者欣赏其精彩的情节、细节和优美的文学语言；较高文化层次的读者从中品出某些本质的东西；更高层次的读者则从中发现作者的意图、观点乃至潜意识，感受到简洁语言背后所掩藏着的丰富的精神世界。



来自边地的清新之风

□陈德民